

※明代學術思想研究專輯※

趙大洲的思想

荒木見悟*著 廖肇亨**譯

一

趙大洲(1508-1577)，諱貞吉，字孟靜，蜀內江人^①。嘉靖七年(1528)舉鄉試，十四年(1535)進士及第，擢庶吉士，特旨授編修。日後，恐怕在他備嘗貶謫的艱辛之後，在一封書信中，關於踏入仕途之初的心志，他如是說道：

翻思向者少壯入仕之初，天心初復，光景稍露。始入靜安之門，頗輕諸累之繁。當斯時也，祇宜退步，知非檢過，畜德以俟實得，而根力輕微，不自禁持，嚙嚙多言，自踏淺薄，遂生一念欲速之心，乃有凌跨古人，旁睨一世之祟令入心腑。（《趙文肅公文集》，卷21，〈寄洗少汾書〉，以下簡稱《文集》）從這裏可以看出，他想趁年輕時建功立業，馳名天下的旺盛企圖心。之後，他雖然三度乞歸，卻仍然累官至右春坊官、右中允、管國子監司業等職。其間，他與中央政府官僚接觸，深切感受到他們對性命之學毫不關心，在他的傳記中，如下說道：

本文原收錄於《中國心學の鼓動と佛教》（福岡：中國書店，1995年），頁99-138。

* 荒木見悟，日本九州大學名譽教授。

** 廖肇亨，本所助研究員。

① 以下趙大洲的傳記，主要依據胡直撰〈少保趙文肅公傳〉（《衡廬精舍續稿》，卷11，以及《國朝獻徵錄》，卷17），同時參考《明史》與其他相關的著作，以上胡直的文章簡稱〈傳〉。但關於大洲的生卒年有不同的說法，〈傳〉說：「（趙大洲）至（萬曆四年）三月望，端坐而薨，春秋六十有九。」《明儒學案》卷三十三〈趙大洲小傳〉的記事與之相同。《神宗實錄》曰其卒於萬曆四年十二月。彭際清的《居士傳》卷三十九曰：「萬曆十年卒，年七十三」。這應該是受到《明史》列傳八十一〈趙貞吉傳〉記事的影響。本文對此從胡直〈傳〉文的看法。

當此時，天下士高者固守物理，紛若射覆^②。一聞知本之學，反加詆訾，其於聖門性道之旨，蓋莽如也。公慨然曰：「學之不明，由性不明也。」進諭六館士，首揭《中庸》性道教為訓^③。大意以天命本然者，即良知也。此萬事之母，百行之主。習識雖蔽，不能滅其明。習氣雖累，不能害其真。是天之所命，不容人僞焉者也。

雖然這裏提到「良知」這件事格外值得注意，不過關於這點，後面還有更詳細的討論。袁中郎曾如此評價趙大洲說：「蜀中，高士藪澤也。近代性命之學，始于趙文肅。嘗竊讀公書，出入禪儒，而去其膚，闢闥所未及也。」（《袁宏道集箋校》，卷 54，〈壽何孚可先生八十序〉）袁中郎如此稱揚趙大洲的功績一事，值得我們加以留意。

嘉靖二十年後半，震撼政壇的一件大事，便是俺答連年的入侵，乃至於演變成進犯大同，逼迫京城的緊急事態。當時的禮部尚書徐階召集百官思索對策，結果一個發言的人也沒有，忍無可忍的大洲挺身而出，放言道：「城下之盟，春秋恥之，且既許貢，則虜必入城，要索不已，即內外夾攻，胡以禦？」大洲並順勢補充他對軍事具體的意見^④，但反而招致了腦海中只有一味姑息念頭的徐階、嚴嵩等人的反感^⑤。然後便是中國政治史上常見的慣例，嚴嵩命令心腹上疏彈劾大洲，職此之故，觸怒了皇帝，下錦衣衛、廷杖以外，又貶謫至廣西慶遠府荔波縣（時在嘉靖二

② 這一句或許意味著朱子學的格物論無法對萬事萬物必然適用，不過只是單純地偶然命中而已。

③ 以下的文字，係以《文集》卷十四〈國學講章〉為主，前半曰：「有天命之性，有人為之性。天命之性者，生質之本然也，良知也。」稍後的文章中說：「夫自一念之微，以至於百為感應，皆則於天命，而不失其度也。自一身之近，以至於國家天下之政理酬酢，皆則於天命，而不失其度也。」

④ 《萬曆野獲編》卷十七「文士論兵」條下曰：「嘉靖以來，名公如唐荊州中丞、趙大洲閣老、趙浚谷中丞、皆巍科大儒，士林宗仰。然俱究心武事，又皆出詞林，足為文人生色。」趙大洲與唐荊川頗有交誼，嘉靖三十九年，當荊川謝世之時，大洲曾經如是感慨曰：「不孝居甚僻，六月末，始聞荊川下世。…嗟嗟，斯人名溢千古，神遊八極。小年促質。烏能限之。第吾輩後死者，日益落寞單子耳。每一念之，神爽慘沮。」（《文集》，卷 21，〈與羅念菴書〉）

⑤ 徐階、嚴嵩、高拱等人與大洲的對立，詳參陳翊林：《張居正評傳》，頁 50；朱東潤：《張居正大傳》，頁 92、《明史紀事本末》，卷 54 等著作。

十九年）^⑥。關於貶謫的辛酸，他如是說道：「三年謫宦，瘴癘疾病，不啻其心苦耳，乃其不肖之身亦已敝矣。」（《文集》，卷 21，〈與聶雙江司馬書〉）三十二年，移徽州府判，歷年，升南光祿寺少卿^⑦，雖然歷任各種官職。但如同《明史》所說：「貞吉學博才高，然好剛使氣，動與物忤，九列大臣，或名呼之，人亦以是多怨。」（《明史列傳》，卷 81，〈趙貞吉〉下），其剛烈的性格，雖歷經貶謫的辛酸依然不改，故其意見多招來反對，以致於自陷於危急之地。然而嘉靖四十五年（1566）時，世宗駕崩，穆宗即位，登用為吏部侍郎兼翰林院學士，一時掌國子監祭酒，兼任日講官^⑧。其進講之內容，現收錄於《文集》卷九至卷十三，從這些文字當中可以如是看出他關於倫理學與政治學一體化的言論。其曰：

莊敬持養，莫切于動作威儀，以定性命，使天真天粹，日以凝聚而不散，則仁者之體具，而仁者之用廣，自有蓋臣為國禎幹，足以建彊盛之資，興安榮之利者，將畢至矣。（《文集》，卷 9，〈講章〉）

不久他又補禮部尚書兼翰林學士，又兼文淵閣大學士，名列臺閣^⑨，對於這樣的榮寵，他自身又是如何看待的呢？李樂《續見聞雜記》如是說道：

隆慶元年，莊皇帝踐祚，謁至聖先師孔子，特起翰林宿儒趙公貞吉為禮部尚書，充國學堂上講書官。陞座飲茶已，而蒙賜賚。儒紳極榮也。尋拜相。趙公，號大洲，為人峭直鯁介，不阿隨。當分宜柄用時，議論常不合，至援先朝故事，欲與分宜同巡邊。晚年拜相，寔出望外。公嘗自言，「趙大洲有箇閣老做，人生信有命，不用安排」。公言非特自道其素，抑欲後進之士，凡事皆行

^⑥ 《文集》卷二十一〈與徐少湖閣老書再書〉，由於有「僕起遷人三數年」，其遭貶謫三年餘，於嘉靖三十三年釋放。另外，當聽聞趙大洲流謫的消息時，蔡汝楠在給友人的書信中如是說：「趙大洲兄，近謫粵尉。此兄堅凝峻拔，迥駕流輩。」（《自知堂集》，卷 18，〈與陳給事中虛峰〉）

^⑦ 《文集》卷二十一〈與嚴介谿閣老書〉一書說：「茲者自南文選署即轉南光祿少卿，令稍從下大夫之列。」對嚴嵩表達謝意。

^⑧ 此際，楊復所在致趙大洲的書簡中如是曰：「恭惟閣下，以聖賢大學之道，輔弼明主，當國家多事之時，東西跳梁，以次底定天下，靜于安瀾，亦足以見大儒之效矣。……主上春秋鼎盛，聰明天縱。邇來朝講久廢，上下闢絕。夫家人父子之間，久不相見，尚生猜疑，況君臣乎。」（《楊復所先生家藏文集》，卷 7，〈趙閣老〉）

^⑨ 胡松著《胡莊肅公文集》卷五〈與趙大洲書〉及《薛中離全集》卷九〈寄趙大洲閣老〉這些書信大約也都是這個時候所作，於是可以看出當時對民生疾苦與士風卑下的指摘，大聲期待改革的聲浪。

法以俟命乎。（《續見聞雜記》，卷 10，97 條）

但他那剛磊不羈的性格，先是與徐階¹⁰、嚴嵩不合，接著又違背高拱，其活躍之場所遂被剝奪，於是返鄉歸里，以舊友晚輩為對象開始講學，不久便接獲穆宗駕崩的消息。老友蔡汝楠以下這封書信，或許就是這時候寫成的。

傳示自責自修，正已無求之旨。如在沈寐，得聞洪鐘撞破昏黑。敬惟我公特立赤霄，旁無倚比。海內講談，空自紛呶，如公秉道守默，復幾人哉。（《自知堂集》，卷 18，〈奉趙大洲先生〉）

對政壇失望的他，萬曆三年（1575），遂閉門讀書，專心整理多年以來蓄積的三教知識，開始執筆《二通》。但由於體力的衰落，畢竟力不從心。直同「不孝須髮盡白，兩足無力，頓衰矣。四方之事非其任矣，所謂徒有是心耳」（《文集》，卷 21，〈復胡柏泉大參書〉）的狀態。結果，《二通》仍然是未完成的結局。其最終變化的姿勢，蔣道林評曰：「讀其來簡，極是和平，殊無向時不可犯氣象，已可見山中所養自別。」（《蔣道林先生文粹》，卷 8，〈復高鶴阿〉）如是，趙大洲完成《二通》成為一個未完成的夢，便於萬曆四年三月中去世，歿後十年，當《趙文肅先生文集》編纂完成之時，許敬庵執筆寫作其序文，當中關於趙大洲的為人，他如是描寫道：

先生少掇魁科，官居館閣，而衣疏茹淡，絕遠聲色，終其身有簞瓢陋巷之風。品格孤高，一塵不染，而忠君孝親，濟世利物，出於天性，皇皇焉，有畏天命而悲人窮之意。天資敏異，於學無所不窺，而好善如饑渴，天下有才慧好脩之士，雖在韋布後生，靡不樂取之以為友。平生言無矯飾，行無依違，進退綽如也。是故釋褐之初，讀書中秘，受異知於世廟。中遭權奸傾陷，竟不可得。後事穆廟，經筵日講，箴誨慨切，先帝為之改容。（《敬和堂集》，卷 1，〈趙文肅先生文集序〉）

上文最後觸及大洲之學，另外又說道：「先生學本蔥嶺，性地空闊，機神元明，吾

¹⁰ 在給徐階的信中，趙大洲針對緊迫的時代環境如是記述：「自壬午以來，長星凡三見，而郊時宗廟朝堂，皆從更新，此氣數也。天道幽遠，腐儒不能妄測。但以人事論之，東藩已撤，虜入二次，如無人矣，而三衛方為向導。北虜牧馬射獵于垣內，不知其幾矣，而邱福等叛人，極力為之先驅。關輔地震，將及二年。山東河竭，地裂而吼，妖言喧騰，不可禁止。此何祥也？東海妖民，造亂五六年，生民死亡，不知其數。」（《文集》，卷 21，〈與徐少湖閣老書再書〉）

未能窺其至。」趙大洲思想的要點，大約可歸結為良知說與佛教（也有些許的道教）的結合，這究竟是怎麼回事呢？以下便是進一步的觀察。

二

根據胡直的傳，趙大洲十五歲的時候，雖然有「年十五，讀王文成公《傳習錄》，驚曰：『予固疑物理之遠於本也。今獲所歸矣。』」的記載，但之後從誰問學卻未必清楚^⑪。李卓吾敘述王心齋學派發展的譜系當中，接續心齋門人徐波石之後的是大洲，之後為鄧豁渠（《焚書》，卷2，〈為黃安二上人〉），雖然袁中郎接受這種說法，說：「夫陽明之學，一傳而為心齋，再傳而為波石，三傳而為文肅，謂之淮南派。」（〈壽何孚可先生八十序〉）根據大洲致徐波石的書信，開頭他說：「別久無緣奉書問。身無羽翮，思君實勞。君所念我，亦應爾也。」（《文集》，卷21，〈與徐波石督學書〉）可以想見兩人之間應該是近乎同輩的關係。另外從題為〈夢波石徐子〉的詩（《文集》，卷6，〈夢波石徐子〉）也有類似的印象^⑫。由於心齋門下林東城在給波石的書信中說：「大洲、孟坡、少岩、鳳崗諸同志，今皆精進何如。諒朝夕相處，自異往昔。」只是心齋門下有忘記年輩前後，彼此交流的風氣，如果波石的性格是「波石之灑然，真忘情於世故者」（《文集》，卷下，〈簡王龍溪年兄〉第六書）大洲刻意執贊入其門下亦不無可能。根據黃宗羲《明儒學案》（〈泰洲學案一〉）當中的介紹，波石最初就學於陽明，後從心齋，以致於信奉良知現成說，列舉他的語錄約二十條，特別欣賞以下這段話，認為十分具有特色。其言曰：

六合也者，心之郛廓。四海也者，心之邊際。萬物也者，心之形色。往古來今，惟有此心。浩浩淵淵，不可得而測而窮也。此心自朝至暮，能聞能見，能孝能弟，無間晝夜，不須計度，自然明覺，與天同流。一入聲臭，即是意念，是已私也。人之日用起居食息，誰非天者。即此是真知真識。又從而知識之，

^⑪ 《文集》卷十五〈贈少宰張龍湖南征序〉中有：「吾師龍湖先生，自學士拜留都少宰之命。」這或許意味著大洲科舉考試合格時，其主考官為張治（號龍湖）。張治的《龍湖先生文集》中未見大洲之名。另外關於張治的學行，可以參見薛方山《方山文錄》卷二十二所收的〈寄張龍湖先生文〉，及〈代九卿祭張龍湖閣老文〉。

^⑫ 其詩曰：「萬里湖天一發通，光風吹落玉壺中。丈夫別去應強健，夜上廬山五老峰。」

是二知識也。

將天地古今收約於一心，敘說一心自然活躍與開展不可夾入私心，此陽明心學的常道。此所以趙大洲說：「先師陽明先生，只提致良知，爲古今之參同，蓋以此也。先生深於自得者也。」就像告子義外之說錯了一樣，程伊川的「在物爲理」（〈易程傳〉）之說也錯了，這些都是繼承王學的主張，不過卻看不出來與佛老接近的痕跡。

雖然可以看出趙大洲接受心學，但值得注意的是，他指出相對於真心，習氣那執拗的黏著，以及其由此而生的諸種弊端。他論治學工夫最完整的文字見於題作〈贈謝給諫序〉一文^⑬，當中列舉爲學五弊。他以爲有志於學須先確然自信。若不信自心而輾轉外求而自蔽益深。「測窺前聖，模度後賢，摘服佳言，飭行善事，身心互持，徒相窒礙。而此念既熟，自謬曰志者，其蔽在不信自心而依遊妄念，逡巡襲取也」（以上第一）。「亦有取自胸臆，懸立標準，即以標準爲師，而別起意念，常受法焉，隱微牽絆，未有止息。抱此情識，自謬曰志者，其蔽在不自信心，而依憑妄念虛恍意見也」（以上第二）。「亦有醉心陳編，馳騖文事，研究糾蹟，增長聞見，剽竊空談，支離著述，身心漂泊，至老無聞。而言語之微，矜持影響，及淹浸既久，家具頗成矣，遂自謬曰志者，其蔽在不自信心，而枉肆妄念，紛紜玩物也」（以上第三）。「又有頗知向學而厭靜喜動，厭動喜靜者，在靜無主，則雜念輪轉而苦眩不寧；在動逐物，則境移心變而煩惱復作。或滯靜而沉昏是宅；或徇動而神守離軀；或照管馳求以爲近取；檢點科列以爲自治。惟此枝條最爲煩多，而終歸於廢學矣，其蔽在不自信心而妄生支離也」（以上第四）。「又有志非眞切，托意矜名，依傍仁義之途而自以爲是，日作心勞之僞而不覺其非，止於補塞脫漏，惟知修飾觀聽。故多欲之根日深，而智慧之種將盡矣。然而性無滅息，本知獨良。或因考古而發憤；或聽人言而忸怩；或因順境而眞見忽開，緬思有爲；或因欲極而天心復見，即求解脫；或惜歲月之不可留；或嘆古人之不易及；或光風霽月之下而暢然自由；或迅雨烈風之前而惕然追悔，皆其本心忽明之端，不可昧也。但舊念既熟而新知尚生。熟者，有欲可依而舉目見前；生者，無本可據而掉背遺失，是以卒歸於不學無志而已矣。其蔽在不自信心而立基無地也。夫五蔽者言其略也」（以上

^⑬ 《趙文肅公文集》卷十五之外，現存另有李贊評《趙文肅公文集》四卷（藏內閣文庫）這段文字的欄外，寫著「說盡學子病痛」這樣的評語。

第五）。以上五者交錯，互相交纏而後果無窮。如今若能直得本心而確然自信，便能廓清諸蔽，洞然無疑，本心自明，不假修習；本性自足，不待旁求。天地萬物，悉為一體，在在具足，浩然充勃。

根據上文，可以清楚地理解：趙大洲克服這種種障蔽，其工夫眼目在於本心自覺的覺醒，體認萬物一體的道理。而此，當然是「陽明一心齋」此一路線的衍伸。

當時表現心的絕對主體性，經常使用《陰符經》的「宇宙在手，萬化生身」一語^⑭。大洲也因為說明「命自我立，性自我具」（《文集》，卷 14，〈國學講章〉）一語，據此以否定「物物有天然之則，事事有當可之處」此種客觀定理之論。（《文集》，卷 14，〈國學講章〉），有鑑於此，他又說：「優游厭飫，以求自得。毋拘舊說，毋蹈淺陋。」

此處宜就其論陽明學與朱子學的關係進一步深入探究。首先，關於陽明學，他曾定義為「蓋王先生學入理界最初之論。故能廓摧理路之礙，而曉然示人以行也。」（《文集》，卷 16，〈重刻陽明先生文粹序〉）現今王門的分裂現象，係由於假名言以修心之故。由於「聖人者，群言之家，而道之岸也」，衆人淆亂名言，是非喧騰一時，係由此偏見故也。順著此一思路，大洲云：「如使閩、浙二大儒，遇孔子而事之，必有以塞其異之源，而不令其末之流也。」但趙大洲最早說「王學入理界之論」當是意指：從理所支配的世界，進而躍進到「理」尚未生成的，而生發「理」的世界。如此一來，對以「理」為生命的朱子學而言，必須說是極不愉快的言論。若以陽明心學為正道的話，不論任何形式，勢必將對朱子學有所壓抑。前已言之，趙大洲對朱子學的格物窮理論曾經有所批評。在給王宗沐的書信（《文集》，卷 21，〈復廣西督學王敬所書其四〉）當中，他更詳細地展開對朱子的批判。若論其要旨，第一堯授舜以「執中」之語，而子思訓中為喜怒哀樂之未發，朱子訓為「人自嬰兒以及老死，無一息非已發。其未發者，特未嘗發耳」^⑮。與子思的訓解不同。第二，闢異意識過盛，不能吸取各家之長。三代以前不限地域通天下之物而具有包容性，孟荀以後，始互相譏訕，至於宋代的儒者，與他方的交通阻斷，矜誇據守彼此的勢力範圍。陳白沙曾嘆宋儒之嚴，朱子法程、張而不信程、張，尊楊、

^⑭ 詳參荒木見悟：《佛教と陽明學》（東京：第三文明社，1979 年），頁 160。

^⑮ 此雖然是朱子的理論確定以前的話語，但趙大洲的朱子學造詣恐怕尚未如是精微，得以辨析。

謝，而力闢楊、謝，凡是靈覺明悟通達之論，盡委之禪，視之爲異端，而懼一言之污。第三，朱子於禪十分陌生，並沒有注意到：他的議論雖似闢禪，實則尊禪。同樣一個人，開始可以學禪，也可以學儒，認爲靈覺明妙乃禪者所有儒者所無其實是大錯特錯。若非靈覺明妙，便是滯窒昏愚。儒者難道以滯窒昏愚爲正學嗎¹⁶？

大洲的筆端在責備朱子氣量偏狹之餘，便順便擁護禪學，如果念及王門之中儒禪論爭之間所產生微妙複雜的波瀾交錯，以上的論述必須說是理所當然。根據王宗沐的回信，其對儒釋之辯抱持一貫的態度，道雖非一，然吾人不應背於正道而有取於釋氏，其曰：

學術各有所宗，要不可使一。譬之適京者，要在同至，得見宗廟之美，百官之富，乃爲極則，而不當問其路之由舟而由車也。……其合於吾道者，固當取其善以相淑，而其畔於吾道者，自然別其途而不通。如佛氏之學，其於心性精微，固與吾儒自有渾合處，而至於其縉祝槁寂，絕去倫類者，亦決不容苟徇。

（《敬所王先生文集》，卷8，〈與趙大洲先生〉第五書）

如此一來，敬所雖然排斥佛教，但對到宋代以來其辯說之煩與爭競之弊達於極盛這點，與趙大洲的見解相同。只是應該注意的是，責備趙大洲對於佛教過於寬大的王宗沐本身也說：「良知之生，在人一點精明靈覺之處。在心爲知，在物爲理。」（《敬所王先生文集》，卷20，〈講義〉）人之使用的語詞與趙大洲「靈覺明悟」幾乎沒有差別，曰「心鏡勤拂拭」（《敬所王先生文集》，卷20，〈講義〉），其啓發來自於見於《六祖壇經》神秀一偈，據之寫作成文。王學與禪學的接近，是透過作爲心學的共通性格無法阻止的不斷進行，「絕去倫類」此一批判，是無法構成阻止兩者靠攏的理由。趙大洲顯然清楚的意識到這一點，不斷深化對禪學親近的方向。

¹⁶ 從以下這段話，不難揣度他的念頭當中經常思考朱子當時的處境。其曰：「予嘗考其世，設處翁之地，而論翁之心矣。其拒禪甚力，惡蘇尤深，詆陸太露，其意亦略可觀矣。蓋南渡之後，高孝二帝，極愛蘇氏文章。所謂家藏蘇氏之書，人講眉山之學也。二帝又皆好禪，故皆內禪以畢其功。予嘗見《佛照禪師奏對錄》，而知朱仲晦之不遇，孝宗決矣，況於光寧之朝耶？翁忠孝天性，剛奮有餘。欲復二帝之讎，而無一旅之托。其文章議論，至於國勢安危之幾，君子小人陞降之際，則芒寒正色，恢拓奇崛，使人凜凜聽之不倦。視其講學訓解，如出二手，誠有以激之也。」（《文集》，卷21，〈復廣西督學王敬所書其四〉）

三

趙大洲入佛的契機，據其〈傳〉，乃由於其母過世之後，感到「人世如飄忽」，〈傳〉復云其「遂兼修出世業，習靜古刹，不櫛沐解衣者數年」。他的佛教信仰不止於單純的無常觀，為了充分掌握世間經濟大業，必須充分體認出世間，也就是以聖俗一體觀作為根源^⑯。對友人擔心他難得具有適任於宦途的才能，傾向空寂之途，化有爲之志爲灰燼，到頭來有損於名敎，對此勸告，趙大洲如是回答：

夫僕之爲禪，自弱冠以來矣，敢欺人哉？公試觀僕之行事立身，於名敎有悖謬者乎？則禪之不足以害人明矣。僕蓋以身證之，非世儒徒以口說諍論比也。吾性中有十八陰界，戕亂我靈明，賊伐我元命。即如我華旦國之北，有一部韃靼種落，日欲蹂躪我疆土，虜殺我人民也。……今僕亦欲以明智定力，破此一身伐性陰賊。雖不能徹底一澄照，睿聖聰明，如古至人，而莊孟以下，欲庶幾也。……夫古之君子，得志則兼愛天下，不得志則康濟一身耳。且一身亦不小也，是天地之心也，陰陽之會也，鬼神之交也，五行之秀氣也，未有不被此根塵識念所壞者。今自顧其身，與凡夫等，而欲造神聖之業，豈不難哉。（《文集》，卷22，〈與趙浚谷中丞書〉）

根據這段文字，可以知道：趙大洲的佛教體驗，並不像多數的禪者，誇示其清明性、孤高性、俊敏性。他意識到迷亂自心的十八陰及其他煩惱的爭持，嘗試明瞭障蔽內心深處的實態。這點與之前介紹過的，他的五蔽論密切相關，因此，在說明欲與本體的關係的時候，他說希望能參照「五蔽」（《文集》，卷15，〈送胡少嚴給事西歸序〉）。因此，像這樣的人，關於他推薦別人閱讀《楞嚴經》的軼事廣爲流傳，不是沒有理由的^⑰。這種內省的傾向，在〈求放心齋銘〉（《文集》，卷23）中，明白

^⑯ 趙大洲回顧年少時的學習生涯。其說：「或探百家指，或習三昧定。」（《文集》，卷18，〈弟仲通壙記〉）

^⑰ 錢謙益著《有學集補遺》卷下〈大佛頂首楞嚴經疏解蒙鈔錄序〉曰：「聞嘉靖中，內江趙大洲，教習庶吉士，課讀《楞嚴》謂：『諸君年長四十，少亦三十。不以此時讀此經，待何時耶。』」〔清〕汪大紳〈題趙大洲先生集後〉一詩曰：「手把《楞嚴》挽土風，詞垣清淨即琳宮，聖賢祭罷明心學，誰與先生了《二通》。」（見《汪子詩錄》，卷2）關於《二通》一書，詳後。

的表現出來。這篇銘文首先敘述了真心的存有充滿乾坤之間，感而遂通天下之故，之後筆鋒急轉，如是言曰：

原此真心，不分愚智，魚躍鳶飛，各識其職。蒙蒙我生，營營自戕，自斲自喪，自迷自狂，自築其牆，自固其防，自放于憂悲愴逸鄙吝貪妒之場，而不悟其非真常也。嗚呼，此獨何心。……嗚呼，易悟者心，難淨者習。呼爲習呼，吸爲習吸。習心作主，須臾不離。辟彼家室，見奪於賊，退處奴隸，僕僕受役。^⑯

不論是前面引用的王宗沐也好，趙浚谷也好，都對佛教不懷好意，因此，對趙大洲所精密敘述的佛教觀不能不有所顧忌。在他的《文集》當中，最直率的展開佛教世界觀的是在給胡直的書信當中（《文集》，卷 22，〈答胡廬山督學書〉）。胡直認為佛教的「三界唯心，山河大地爲妙明心中物」，雖然沒有大錯，但棄絕人倫，心不能充分發揮作用。其曰：「蓋釋氏主在出世，故其學止于明心，明心則雖照乎天地萬物，而終歸于無有。吾儒主在經世，故其學貴盡心，盡心則能察乎天地萬物，而常處之有。則是吾儒與釋氏異者，則盡心與不盡心之分也。」（《胡子衡齊》，卷 2，〈六錮〉）^⑰承認心學同時是儒釋共通的根本，只是對心的活用的方法有程度的差異。爲了回答胡直提出，關於心的包藏力的問題，趙大洲如是言曰：

來諭云：「道通天地萬物，無古今人我。」誠然誠然。但云：「欲卷而藏之，以已立處未充，不能了天地萬物也。」斯言似有未瑩徹處耳。愚意謂當云：「己力未充，故時有滯執處，時有礙塞處。」於此但假漸習薰修，久之不息，徐徐當徹去矣。即徹處謂之先天，而天弗違，即未徹謂之後天，而奉天時也。作如是功者，日用間種種色色，剝剝塵塵，皆在此大圓鏡智中，卷舒自在，不見有出入往來之相，陵奪轉換之境矣。……《中庸》曰：「天命之謂性」，言不假人爲，無善無不善也。「喜怒哀樂之未發，謂之中也。發而中節，謂之和也」，指其率性而不假人爲之處也。……佛氏「不思善，不思惡，見本來面目」之義，與此同也。豈可以《中庸》之言，謂墮于情緣，難免生死耶？公所引「情順萬事而無情」者，即《圓覺經》隨順覺性之謂也。於此了了，則世法

^⑯ 詳參《文集》，卷 23，〈克己箴〉。

^⑰ 黃宗羲批判此種說法曰：「羲則以爲不然。釋氏正認理在天地萬物，非吾之所得有。故以理爲障而去之。其謂山河大地爲心者，不見有山河大地。山河大地無礙於其爲空，則山河大地爲妙明心中物矣。故世儒之求理，與釋氏之不求理，學術雖殊，其視理在天地萬物則一也。」（《明儒學案》，卷 22，〈胡廬山小傳〉）

與出世法，一齊徹去無餘矣。……且公謂之了天地萬物古今人我者，愚意度之，當如李異人《合論》謂「自他不隔一毫端，始終不離當念」云耳。……能隨順覺性，則即體即用，即用即體，體用一如矣。夫學至於體用一如，則達乎大覺圓頓之門矣。古人不貴踐履，只貴眼明。若能于此具眼，歷落分明，雖于日用之中，官私之事，情有滯執處，念有礙塞處，一歸于習氣播累，漸資薰修方便，而徹之耳。（《文集》，卷 22，《答胡廬山督學書》）^{②1}

也就是說：在大圓鏡智的境界中，天地時空被理解為一體，卷舒自在，世法與佛法合一，但若此處感到意猶未盡的話，如前所述，應該去除習氣之累，厲行漸修之薰習。借用這個時代流行的術語，意即：大洲亦襲染頓悟漸修之風潮。雖然由於頓悟之故，他抬出李通玄的《華嚴合論》，但他雖然賞重其書，以至於「凡遇同好，即以此妙義告之，乃性命之極談也」（《文集》，卷 22，《寄廣西憲長胡廬山書》）的地步，不過這是因為當時佛教的大護法陸五台的恩賜。陸五台的書信如是說道：

不肖前年大病，幾喪其生，念經世本非其才，又無其念，志亦已矣。惟出世一念頗篤。近亦稍有所契，惜未獲左右請正耳。新刻《華嚴合論》，遇彭澤令段君入蜀，付之寄上。（《陸莊簡公遺稿》，卷 5，《與趙大洲相公》）

據此可知，趙大洲投入佛教，有超過一個儒者的本分，趙大洲被評價為：「大洲視陽明改頭換面，更進一著。」（《牧齋初學集》，卷 63，《文恪傳公神道碑》傳文恪語）、「至明之趙大洲，始以儒證佛，以佛證儒」（江藩：《宋學淵源記》後記）。也是理所當然。事實上，趙大洲在當時，其影響力據說到達「今之譚禪者，皆宗趙大洲『只貴眼明，不貴踐履』之說，終日談玄說妙」（《牧齋初學集》，卷 86，《跋傅文恪公大事狂言》）的地步。只是，王門當中，與佛教最接近的人是龍溪，心齋此種傾向極為薄弱，其子東崖雖然出入玉芝法聚之門，但也見不著多少佛學的影子。於是問題是：趙大洲與龍溪的關係。在兩者的文集當中，並未發現重要的往來書札。但《龍溪集》（卷 18）中，可見到其與大洲夜坐佛寺所作詩兩首^{②2}，據此，可以察知：兩者由於禪而有密切的交情。就此，黃宗羲勢必要對逸脫儒流，而醉心於禪的大

^{②1} 袁宗道曾舉揚一些他可以贊同趙大洲的話語（《白蘇齋類集》，卷 22，《雜說類》），曾經採用其中的部分文字。另外焦竑也引用大圓鏡智前後的文字作為執滯除去的範本（《澹園集》，卷 47，《崇正堂答問》）。

^{②2} 根據趙大洲《文集》卷六〈四祖山絕句次韻〉的序言，可以得知嘉靖三十三年四月十五日，大洲與王龍溪還有其他兩名同志共組詩會。

洲之身影評曰：「彌近理而大亂真者。」（原朱子〈中庸章句序〉，見黃宗羲：《明儒學案·趙大洲小傳》），但如同本文最初提及，趙大洲作為士大夫，具有旺盛的責任意識，一再就肅正官箴、嚴整綱紀、財政重整、防衛國境等事項提出建言^{②3}。正因如此，清儒惲敬為趙大洲辯護曰：「趙大洲、陶石賓諸儒，何嘗不立氣節，何嘗不立事功，何嘗不敦倫紀。雜則有之，庸則免矣。」（《大雲山房言事》，卷2，〈與李汀州〉）

自我過分的膨脹，自心成佛的惡質禪法之所以橫行的原因即在於過分相信「即心是佛」；關於這一點，如前所述，大洲曾仔細思考了障礙真心機能的習心、習氣的調治。雖然有人懷疑趙大洲陳義過高，實際上恐怕並不適用（《林東城集》，卷下，〈簡趙大洲內翰〉）；另外亦有非議其為仙釋所惑，溺於習靜者（《蔣道林文粹》，卷8，〈寄大洲趙內翰〉）^{②4}。如前所述，趙大洲大致是與當時頤悟漸修的風氣合拍，乃遭這樣的批判，遂被定位為「趙大洲、陸五台之剛簡，近佛之直截。」（《耿天臺先生文集》，卷4，〈與吳少廬第二書〉）以論佛之法來解釋其剛直的性格，自然伴隨出人意表的嚴酷評語。李卓吾曾有一則關於趙大洲的軼事。其曰：「記徐魯源與吳悟齋，同送大洲。悟齋極口論道學。大洲曰：『公真好色。』徐魯源續言：『人愛世上聲色貨利，都不愛道，曾不知有大捨，有大取。』大洲持杯大言曰：『我進公一著。我這裏無取無捨。』」（袁中道：《祚林紀譚》，收入李贊：《李溫陵外紀》〔《明季史料集珍》本〕，卷1，頁25）此等銳利的禪機，總是在他身邊飄溢著^{②5}。

四

^{②3} 試舉一例，參照《文集》卷二十二〈與高中玄閣老書〉。另外，李贊評《趙文肅公文集》卷一〈乞求眞儒疏〉中附有「說得十分了，但忤衆耳」這樣的評語。

^{②4} 清儒申涵光曾經如下加以嚴厲批評。其言曰：「趙大洲母，夢二比邱牽衣求棲，遂生大洲及弟蒙吉。此事即眞，亦不宜載諸傳誌。蓋浮屠家好尊其教，謂吾儒之賢且貴者，皆其徒再生耳。而儒家亦每引其事以為重，何也？」（《荆園進語》，頁5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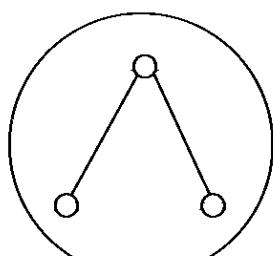
^{②5} 黃宗羲曾經記述一載軼事：先生如京師。大洲訪之郊外，與之談禪。議論蜂湧，先生唯唯不答。大洲大喜，歸語人曰：「今日降卻萬鹿園矣。」陸平泉聞而笑曰：「此是鹿園降卻大洲。何言大洲降卻鹿園也。」（《明儒學案》，卷15，〈萬鹿園小傳〉）

趙大洲應蔡汝楠的要求，將他對三教的展望，整理成七幅圖。（《文集》，卷23），七幅圖之首是描寫一圓相的混元圖。題曰：「混元一圖，實無量妙義，百億三昧之所從出。」如其言，其象徵實在根源之無形無爲。從其引用「有物先天地，無形本寂寥，能爲萬物主，不逐四時凋。」（善慧大士語）此一著名的禪語考量，作者的用意便可大致掌握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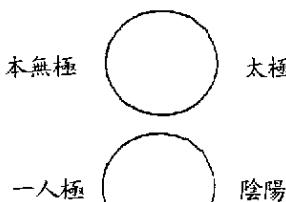
第二，在黑圓相的下半有白色殘出新月形的出庚圖，第三是相反上部殘存新月形的浴魄圖，彼此象徵陰火與陽火，亦爲創生萬物的文武之火，表示混元圖中的妙有眞境。（據道經《參同契》）

第四圖在圓相當中具有伊字三點，第五圖則在圓相中描繪卍字，曰：「右伊字卍字二圖，性宗之底蘊也。」表示混元圖中的眞空妙界。第六是太極圖，第七是河圖。其曰：「依華山舊傳本寫出。」此與通行本並不一致。儘管如此，此二圖仍是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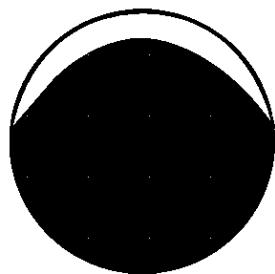
「五常之本，九法之宗，名理之源，道術之門，寔混元圖中妙有眞空之境，世間法與出世法皆備矣」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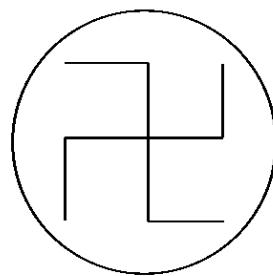
圖一 混元圖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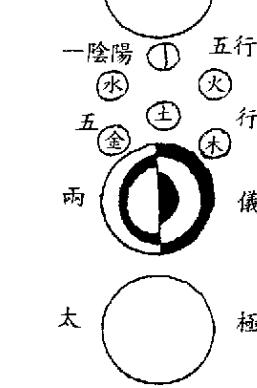
圖二 出庚圖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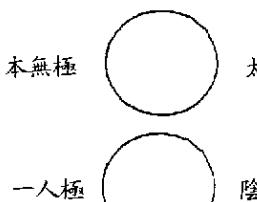
圖三 浴魄圖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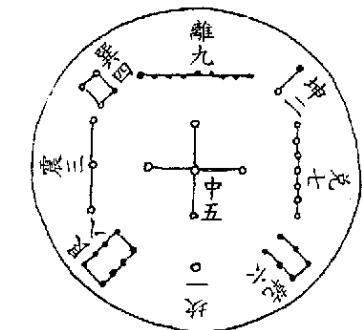
圖四 伊字三點之圖



圖五 卍子輪相之圖



太極



圖七 河 圖

以上簡單歸納，其圖集合儒道佛三教的精華，顯示其真空妙有、世法出世法，而且七幅圖並非孤立散亂的個體，而是與其他六圖相互攝取融合（「一以攝六而無餘，六以顯一而無盡。混一之六者，未始有物之先也。了六之一者，萬行元備之後也。……儒者見之曰儒，仙者見之曰仙，佛者見之曰佛」。）（「七圖總持」贊語）黃宗羲對此評論曰：「先生蓋見鴻仰以圖相創立宗旨，與太極圖相似，故扭合為一，而不顧其理之然否也。……英雄欺人，徒自欺耳。」（〈趙大洲小傳〉）儘管如此，與其墨守傳統的圖像，毋寧思考適合自己的思想的圖相，實是心學橫流的明末大勢所趨。不過如同大洲所言：「五家宗門，獨鴻仰一派，入門便打圓相。」（《文集》，卷21，〈答大理李中溪書〉）其以鴻仰宗的六圓相為模範自無可疑²⁶。

如前所述，趙大洲晚年貫注最多熱情，始終未能完成的是：《二通》（《文集》，卷23，〈史業二門都序〉），《二通》乃是由內篇經世通與外篇出世通共同組成。內篇分成史通門四部（統部、傳部、制部、誌部）、業通門四部（典部、行部、藝部、術部）；外篇進而分成說通門三部（經部、律部、論部），外篇再附以外篇宗通部（單傳直指部）（《趙大洲集》，頁759）。

外篇三部則根據佛教的慣例而設。

那麼，趙大洲編輯《二通》的原意在那裏呢？他說：「夫學術必助于治理，治理必原於學術。二門通矣，世可經矣。」另外，根據佛教的說通、宗通二門，可以出離世間。「約要而言，經世者不礙于出世之體，出世者不忘於經世之用。然後千聖一心，萬古一道，聖人憂世之念，可少慰矣」（《文集》，卷23，〈祭古聖賢文〉）。真正的出世，若不是奠基於出世的信念是不可能的。

彭際清曰：

自唐以來，學士大夫儒佛之辨，斷斷如也。大洲先生作，而兩家之難通。非深入夫不二之門者，惡足以與於斯哉。……《二通》之作，蓋將遊戲乎昆盧性海中也。嗚呼，先生丈夫之雄哉。（《居士傳》，卷39，〈趙大洲傳贊語〉）

大洲入佛的契機，雖然係由於遭逢母喪之故，其後，又目睹了仕途之中官僚階層難以度化的心術的醜陋，派閥的暗鬥，愛民護生精神的欠缺。為了正本清源，當然必須倚仗「入理界最初」的良知說之力，進而心學的深化，勢必需要考慮基於佛教教律禪的心的「剝蕉」；所謂「剝蕉」，也就是將芭蕉剝了又剝，以窮盡其核心

²⁶ 關於鴻仰宗的六圓相，詳參《人天眼目》，卷4，「鴻仰宗」條。

的實態。其曰：

今之論者，欲胥率有徒同出一途，則千萬一喙，而真妄茫然無別，遂令剽竊緣飾之儕，得窠臼其中，此不剝蕉之故也。夫觀蕉之外，非不蒿然大也，而不知中實無有。今持此術以履于世，則剽竊緣飾之情，亦易以見。蓋利害得失，毀譽幾微之際，而肝膽盡章矣。（《文集》，卷 21，〈復廣西督學王敬所書其三〉）

大洲的佛教思想似乎是將見於《華嚴合論》的大心凡夫的動態變化，與出自於《楞嚴經》的微細妄念的分析合而為一，此係由於禪的決斷再加誘導故爾。大洲寫作《二通》，乃是在重用他的穆宗去世之後，萬曆三年從政壇引退後不久之事。他曾對其晚年心境如是曰：

僕西川鄙人也。睥睨功名富貴三十餘年，今俱知不可得矣。惟有一衲，直悟曹溪之宗，坐嘯峨嵋之月。雖老矣，力猶能辨之。餘則碌碌不足道也。（《文集》，卷 21，〈答何太華司馬書〉）

其以餘生之力，精進製作規模宏闊的《二通》，可惜其志未果，翌年便往生他方了²⁷。

五

最後必須討論的是：趙大洲與鄧豁渠的關係。如前所述，李卓吾曾說：「大洲之後，為鄧豁渠。」（〈為黃安二上人〉）鄧豁渠真的是趙大洲思想忠實的繼承者嗎？鄧豁渠雖與大洲為同鄉²⁸，但自視甚高，為諸生教導時，曾誇道當今為實學者，值得推許的前輩一人也無。當時趙大洲雖以文章氣節知名，但鄧豁渠並不以此

²⁷ 此處就可以說明大洲與佛教徒之間因緣的軼事，引用三則以供說明。一、瞿汝稷的〈峨眉山別傳和尚碑銘〉曰：「蜀人士向風歸德，自大學士趙公貞吉而下，皆以師禮延之。」（見《閻卿集》，卷 11）二、禪宗真圓遍融被密告為狂僧，大洲為免其罪而極力奔走。（《補續高僧傳》，卷 5，〈遍融師傳〉）三、嘉靖三十六年，憨山德清十二歲時，在南京報恩寺，大洲一見德清，便鼓勵他說：「此兒當為人天師也。」（《夢遊集》，卷 53，〈德清年譜〉）

²⁸ 關於兩者詳細的關係，詳參〈鄧豁渠的出現及其背景〉一文（譯者案：中譯發表於《大陸雜誌》97 卷 4 期〔1998 年 10 月〕，頁 15-26）。

爲真正的實學。偶爾遇到大洲爲諸生講聖學於東壁，而鄧誥渠爲諸生講學於西序。由於講場接近的緣故，朝夕聽聞大洲之聲，乃至於對趙大洲的教學思想感到佩服。（李卓吾：《續焚書》，卷2，〈南詢錄序〉）但這並不是他求道的終極目標。根據可以稱之爲其自傳的《南詢錄》一書，其不問三教，四方尋訪師友行腳苦行的姿態實爲淒絕。五十一歲時（嘉靖二十七年），終於落髮，號曰太湖。下定決心脫離一切既成教學的限制，追求個人能夠了然於心的見性開悟。試舉其內心不滿之一端，其曰：「陽明振古豪傑，孔子之後一人而已。」（《南詢錄》，頁44）又曰：「覺得陽明良知了不得生死。」（《南詢錄》，頁2）；「良知神明之覺也，……不能出造化之外」（《南詢錄》）。吐露了他對良知說的根本懷疑，他最終的目標還是到達不爲五行所支配，而到達脫離五倫五常拘束的境界更不言而喻。其曰：

宇宙中一切有形有色，皆爲五行造化管攝，不得自由。蓋以一切皆是五行造化作成，故五行造化，得以撥弄富貴福澤、困窮拂鬱、壽昌夭折，種種不同，皆所以撥弄之也。苟於其中，欲超出五行造化之外，得大休歇，得大安樂，豈易易哉？（《南詢錄》，頁45）

先前曾經說「大洲視陽明改頭換面，更進一格」的批評，但是趙大洲所說的五蔽論、七圖、《二通》等，其目的正在於將經世與出世一體化而確立嚴正俊敏的人性，並樹立具有效果性的功業²⁹，而且他的意識中，仍是欲將良知進行與時俱進的改造，故而仍然應該加以寬恕。但鄧誥渠的情況是良知說的纜繩已經不復存在，如同斷線的風箏在宇宙間自由飛翔遊戲。如此一來，對人倫、經世不負責任的做法，大洲絕對不能容許。在給胡直的書信中，趙大洲如是說道：

吾觀渠書中，覬望有待之多，自負張皇之甚，輕侮前訓，以表己能，墮于業罪，而不自覺。嗟嗟，雲水瓢笠之中，何爲乞墦登壇之態耶！宜見笑于大方之家矣。（《文集》，卷22，〈答胡廬山督學書〉）

這段話不就是有對於鄧誥渠這個棘手強悍的人物棄之不顧的意思嗎？耿天臺贊成大洲的處置，他說：「其師門亦已重斥之矣。吾黨尚多惑之，豈不誤哉！」（《耿天臺先生文集》，卷16，〈里中三異傳〉）

²⁹ 因此，鄭曉對趙大洲的爲人曾如是評論曰：「某日寓燕山，時時班行中睹公顏色，友朋中聞論議，竊仰公忠諒明潔，超脫世累，眞有根器，而又能充之以問學。今所謂天下士者，非公其誰。」（《端簡鄭公文集》，卷3，〈與趙大洲〉）

然而對於鄧豁渠具有無限善意的李卓吾，對於趙大洲這個嚴厲的忠告，認為是給胡直這樣標準學者一個不得已權宜的說法。為了不要錯認了大洲的真意，他如是說道：

承示云，趙老與胡氏書，極詆渠之非，曰「雲水瓢笠之中，作此乞墦登壘之態」。覽教至此，不覺泫然。斯言毒害，實刺我心。我與彼得無盡墮其中而不自知者乎。當時胡氏必以致仕為高品，輕功名富貴為善學者，故此老痛責渠之非以曉之，所謂言不怒則聽者不入是也。今夫人人盡知求富貴利達者之為乞墦矣，而孰雲水瓢笠之眾，皆乞墦耶？使胡氏思之，得無知斯道之大，而不專在於輕功名富貴之間乎？然使趙老而別與溺於富貴功名之人言之，則又不如此矣。所謂因病發藥，因時治病，不得一概，此道之所以為大也。吾謂趙老真聖人也。渠當終身依歸，而奈何其遽舍之而遠去耶！然要之各從所好，不可以我之意而必渠之同此意也。（《焚書》，卷1，〈復鄧石陽〉）

李卓吾這封信，一如往昔，波瀾般飽含抑揚，其真意甚難確知。大洲在給胡直的書簡中所說，關於鄧豁渠的批判，若只照字面解釋的話，如前所述，只能解釋為其責備他周遊四方、任性使氣過著漂泊的生活。但李卓吾認為輕視功名富貴，極度廉潔的胡直，實在過於單純，以致於背離實相，鄧豁渠的生活方式，較胡直相形之下，應當更加值得誇耀。何以故？由於其追求性命之理的熱情遠遠不能相比之故。由於察覺到這中間的巨大落差。大洲故意斥責鄧豁渠，不當獨尊己道，而欲使其理解每個人都有不同的生活方式。換言之，關於趙大洲與鄧豁渠的關係，在李卓吾來看，正如「若趙老則止有鄧和尚一人。然鄧終不如趙。然亦非趙之所開悟者也」（《續焚書》，卷1，〈與焦漪園太史〉）吧。袁中郎的看法又稍有不同。他說：「文肅別派為渠上人，渠之傳多在楚，而喜為任誕，公能矯之以行履。」（《袁弘道集箋校》，卷54，〈壽何孚可先生八十序〉）既然稱之為「別派」，也正說明了鄧豁渠未必是大洲思想全面的繼承者。徐波石——趙大洲——鄧豁渠此一系譜似乎有個什麼東西一以貫之，但彼此的個性又有極大的差異。或許這可以稱之為當時陽明學全體吧。特別是關於心齋一派，袁小修說：「蓋以心齋從來氣骨高邁，亢不懼禍，奮不顧身，故其兒孫都如此。所謂龍生龍子，果然非虛。」（《珂雪齋外集》，卷15，頁11）李卓吾當被問及關於趙大洲與鄧豁渠的關係時，如是回答：「鄧老一生是箇擔板人。所以學問也有些擔板。大洲卻圓。」（《珂雪齋外集》，卷15，頁13）清朝的汪大紳說：「兄一見趙大洲論學書，即能判為良知嫡傳。真可畏人

也。」（《汪子文錄》，卷 5，〈與彭允初四〉）心齋學派大多數人物的名號，入清以後經常為人所遺忘，趙大洲是少數的例外之一^⑩。

^⑩ 明末文人鍾惺曰：「予過大洲之鄉，讀其書，想其人，精神志學，原委指歸，多與先生合，今世頗知惜江陵，不知思大洲。」（《隱秀軒集》，卷 34，〈告雷何思先生〉）不過若從朱子學的角度，將他視為最劣濫的思想家而加以貶斥，如呂晚村曰：「趙貞吉亦自謂：『不諱禪學，禪正聖道之精微。朱子自割以授二氏耳。』盜憎主人，民惡其上，其悖妄一轍。正可見其底裏所自出。」（《四書語錄》，卷 14，頁 3）日本的朱子學者谷秦山也說：「趙貞吉，怪誕不經之士。」（《泰山集》，卷 31，頁 6）